

被遗忘的年代

T H E
F O R G O T T E N
A G E S

气候的外生冲击与17世纪西欧社会变迁

孙义飞 著

气候
—
人
口
—
军
事
—
文
明

非外借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世界文明史研究丛书 12

被遗忘的年代

气候的外生冲击与17世纪西欧社会变迁

孙义飞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遗忘的年代:气候的外生冲击与17世纪西欧社会变迁/孙义飞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

ISBN 978-7-108-05812-6

I. ①被… II. ①孙… III. ①气候变化—关系—社会变迁—研究—西欧—17世纪 IV. ①P467②D7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0843号

责任编辑 成 华

封面设计 米 兰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市梅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15.75

字 数 220千字

定 价 58.00元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气候的外生冲击与 17 世纪西欧社会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学的视野”
(项目批准号: 12YJC770051) 的资助成果

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序

这部以17世纪欧洲社会变迁为主要探讨对象的著述，为义飞同志十余年（先后经历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博士学位论文写作和承担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等数个阶段）辛勤付出之后，收获的一份沉甸甸的成果。其中既显现出义飞同志多年在跟踪国际学术前沿动态方面的沉潜之功，又承载其自身独具个性的思考与探究。当全书杀青，行将付诸刊行之际，义飞向我索序一篇。笔者虽笔耕不辍，但极少为人作序，其缘由在于自己学力有限，才识不济，实在不堪充任“作序者”之责。然回首以往，自己的确在一个时期内对应该如何评估17世纪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特征有过一些思考和体会，书写过一些文章。特别是在博士生研讨班课堂上与义飞等年轻学子就此问题有过长时间的切磋、研讨。有鉴于此，笔者方敢斗胆拾笔，作此文，以为书序。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国内有关世界历史或欧洲史研究及评述中，经常将16世纪以后欧洲或西方的历史状况表述成一种波澜壮阔大步向前的进程。似乎自16世纪始，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航海运动等巨变推动下一直处于向现代社会发展的直线演进轨道之中。17世纪

中所发生的英国革命、理性的开端、科学的兴起等各种历史事件及其时代功用和意义，只有而且也必须按照16世纪的启动与18世纪的结果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即以社会转型（或曰制度转型、文明转型）模式来进行认识，才能获得正确的阐发和解释。至于17世纪这一百年间，西方社会运动全部进程所包含的各种内容，特别是它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苦痛、曲折、徘徊则都退居幕后。当时西方社会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内涵复杂性和所面临的多种发展的可能性都被现代化进程一个维度遮蔽起来。一言以蔽之，现今人们所批判的“线性发展史观”和对历史简单的处理方法，似乎在以往对17世纪欧洲历史的认识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虽自15世纪末始，西方社会发展有了相当起色和一种新气象，但是它每一步进程又都充满着艰辛、苦难、徘徊、曲折甚至倒退。西方史学界普遍认为在“延长的16世纪”中取得长足进步之后，西欧各国又陷入一场“17世纪普遍的危机”之中。20世纪中叶，围绕着“17世纪危机”，西方史学界曾爆发过一场由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首先掀起的、有众多史学家参与的大规模论争。在是否存在过一场危机以及这场危机的性质、强度、范围和作用影响等各个方面，学者们见仁见智，观点各不相同。但在当时西欧的确发生过一次剧烈的结构动荡这一事实的确认上，各家看法则基本一致。从对这场论争的过程和文献的辨析中，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近代早期西方文明发展的复杂性、艰难性、起伏不定的周期性。而对这些，国内史学界所给予的关注、研究和认识应当说是不够充分的。

当我们将17世纪西方历史进程进行一番冷静的回眸和对17世纪之后欧美学术界对这一世纪的认知与评估进行一番客观而细心的梳理之后，就会发现这个世纪本身的状况和它在西方历史整体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是极为复杂又饶有趣味的。可以不夸大地讲，对17世纪西方社会运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行深入的研讨与反思，对于中国史学界而言，构成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义飞同志所选择的这一研究课题以及其十余年辛勤探究的价值与意义便显现了出来。

二

作为一位最早阅读此书文稿的读者,笔者认为义飞同志的著述中值得首肯或称道之处,有以下诸端:

第一,辨析、评判、梳理有致。

在对西方学界有关 17 世纪历史研究状况的学术梳理与辨析上,义飞同志用力尤多,所获颇丰。若将此部著述细读,读者便知这一评价绝非虚言。他在书中以一章的篇幅,近三万言来完成这一方面的工作。其中既有对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探求历程的客观概述性介绍,也有对其争论重点的客观辨析、评判;既对研究现状做了类似白描式的勾勒,又从史学研究变迁角度对这一现状得以生成的缘由加以阐释,认为正是历史观念、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等诸方面的变异,西方学术界才有了对 17 世纪历史演进过程的重新认知。正如义飞在书中所言:

西方学术界的这一论争也揭示了西方学术界在解释社会转型中存在的连续和变革、内因和外因、结构和事件之间传统的二元对立问题。理论或模式的多样化,为西方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时提供了各种研究工具和具体的选择,这同样给可能的使用者提供了选择的问题,也给了他人以问难的机会。然而,正是在这种选择和诘难中,西方学术界的学术研究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

尤其需提及的是,义飞同志非常坦诚地告知人们,自己的工作就是在上述西方学界业已获取的成就基础之上而展开的。此番梳理、评判工作或许还可能存在某些疏漏之处,其评价或许不够全面、准确、妥当,然一位青年学者能够对前人或别人学术劳作和努力给予如此的尊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自己的学术探讨,不能不谓是一件值得欣喜之事。记得当年北京大学历史系高毅教授在主持义飞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时,就曾对此予以首肯和较高评价。

我素来主张在对某个问题进行研究时,首先也必须对这一领域学术史进行梳理和辨析。无论在为学学理上还是为人义理上,这都是一位具有学术良知的学者在阐明自己学术主张之前,必须完成的一种程序,也是严格自律的表现,更是捍卫与保持严谨学风的应有之举。在国内学术研究尚显浮躁的当下,更应如此。只有这般,我们才能表明自身工作与他人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才能表示出对他人劳动的承认、尊重,才能真切地确定自己出发点的方位。而更重要的是,彰显他人的成就并不会影响我们自己学说的创建。同时,我们又不能满足于任何已有的成说,不能囿于权威的定见,否则,断无进步、发展的可能。中外学术史发展历程表明,对以往学术成就进行纯正意义上的批判,是学术发展的前提和必要途径之一。但其意义绝不在于一味地“破坏”和所谓的“解构”,更主要的是能够以一种建设性姿态,将学术问题置于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框架之下加以深入研讨。

第二,视角调整,多维关注。

以往学界在西方近代社会变革研究方面,成果颇为厚重,后人理当给予尊重,不可随意菲薄诟病。然而新时期以来,新说迭出,不断地向前推进。这种进步变革体现在诸多方面:除了史观的变革之外,还体现在史学研究视野的拓展和史学研究方法的调整等等。而这些拓展与调整导致了17世纪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人口、社会、生态等各种基本构成因素皆被纳入到史学考察研究的视野之中。而在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手段上,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注重考证史料,力求应用原始材料,以叙述往昔政治事件来试图再现真实的历史的方法逐渐被超越。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的西方社会的自然科学的繁荣发展,为史学研究手段、方法、途径的借鉴、扩展和丰富提供了广阔前景。西方新史学以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运用为前提向纵深发展,借鉴、吸收了其他学科的新技术和方法、理论和概念,于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史学研究新方法,如计量系列分析、放射技术分析、结构分析、比较研究方法等等。

义飞同志在对西方史学研究前沿状态的密切跟踪观察过程中,敏锐

地捕捉到这些新的动向,有批判地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并有意识地引入到自己的思考和研究之中。如在本书第二章“气候与生态:西方文明变迁的基调”中,便将气候、生态作为研究的核心话题,甚至是全书立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继而在第三章“精神和文化:戴着镣铐的舞蹈”、第四章“军事与战争:锻造西方文明”、第五章“人口与社会:危机与变革”等章节中,也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展开自己的论说,从而使其对17世纪西方社会、西方文明的思考和探究有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气象。

第三,空间:西方与世界。

在全书最末的第六章中,义飞的追寻探究出现了一种转向,即从前几章仅局限于亚欧大陆西方一隅拓展开来,将西方与整个文明世界并置一处,特别着重将西方社会发展或变革置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空间格局下来加以考量。探索空间的这一转变,同样引发大量值得重新思考、重新判断和重新定夺的问题。而近十余年来,许多学者已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非常必要予以关注和汲取。重要的是不仅要将在17世纪的西方社会的历史放到当时那个时代来对其进程和特征加以认知和评说,还要放到当时那个整体世界格局中和文明历史的总体进程中来看取它的价值与作用。当然,如何认知、评说、判断甚至做出定论,尚需更多的因素参与,绝非完成了这种空间转变便可即刻将历史的真实或真相全然揭示出来,但研究空间的拓展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和条件。而且无论对于破除欧洲特殊论、西方中心论等传统窠臼,还是超越历史认识论中的线性发展史观和简单处理历史问题的习惯做法,进而对17世纪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艰难性、曲折性和多样性问题做出深入而全面的揭示,都必须如此。

行文至此,按说该停笔了。相信读者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阅读,对此书的可否、长短、优劣做出自我的判断。笔者只是想说,任何一种历史认识、研究都没有也不会有穷尽之时。作为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整体发展进程中的17世纪,其所具有的独特地位、独特性质和独特魅力,需要研究者们付出极大的努力方可有所成就,而现在尚远远不是做出定论之时。

换句话说讲，一个“漫长的 17 世纪”中西方社会与西方文明变迁的真实图景，肯定不会是一笔便能绘就的。但值得肯定和欣慰的是，当下国内史学界有一批学者，如义飞同志，正在为此而付出努力。笔者也相信随着不断的付出，探究的逐步深入，我们肯定会逐步地靠近那段真实的历史，那种历史的真实，而这也正是数十年来一直从事西方文明史研究工作的笔者的自我期许。

王晋新

2014 年夏于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引言

16至18世纪,是所谓的近代早期西欧社会文明转型时期,在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术界久盛不衰的学术热点问题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西欧近代早期社会历史研究所勾勒、描绘并传递给我们的是这样一幅宏伟壮丽的图景:大航海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大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这些“运动”“革命”“改革”“复兴”以一种波澜迭起、汹涌澎湃的态势,不断地推动西欧社会阔步前行。西欧社会似乎由此踏上了一条笔直向前的康庄大道,飞奔向前,渐行渐远……西欧社会发展的进程果真如此吗?

与此同时,在这段研究时限之中,16世纪因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18世纪有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而成为学术界学术关注的宠儿,而介乎二者之间的17世纪则鲜有人谈及。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社会、经济以及马克思主义学派历史学家一直很关注更具革命性的16和18世纪,却极少顾及17世纪。^①而另一位学者则指出:“那镶嵌于16世纪和18世纪之间的17世纪有时似乎没有自己的特

^① J. V. Poliřenský, *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1618 - 1648*,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 另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页注12。

点”，“我们所得到的关于这个位于二者之间的世纪的情况仅仅是诸如‘过渡’‘变迁’之类含混不清的术语。”^①“我们一遍遍重复被错误所扭曲的无论是对法国还是对作为整体的欧洲都所知甚少的对17世纪的认识。”^②17世纪遂成为学术研究中两个发达区之间的欠发达区。这是如何造成的呢？荷兰史学家I. 舍弗尔(I. Schoffer)认为：“这可能是传统主义妨碍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但我们确实应该给予17世纪一个应有的位置。我们的想象需要它。”^③是该修正它的时候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学科的发展，中、长时段的世纪史开始越来越多地步入西方学者的学术研究视野之内。为此，从20世纪中叶起，西方史学界对17世纪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进行了系统、深入、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众多或相同、或相似、或具有明显差异的观点，掀起了一场为时长久、规模宏大的学术论争，即关于“17世纪普遍危机”的大论战，从而使得西方学者对17世纪史的研究状况大为改观。在众多西方学者看来，17世纪西方文明经历了一场普遍危机，它是西方中世纪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的关键时刻，是位于两个经济上升周期之间的下降周期，在这一时期内，政治秩序动荡、经济衰退、战争频仍、瘟疫流行、人口下降……因而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纪”，“是一个产生了严重动荡、面临严重考验的时代”。^④而一些学者则对此种论调予以坚决反对，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黄金世纪”，荷兰、英国蒸蒸日上，法国强大且生机勃勃，这一世纪的总人口并未有任何下降；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伟人辈出，产生了路易十

① Ivo Schoffer, "Did Holland's Golden Age Coincide with a Period of Crisis?", in Geoffrey Parker and M. Smith eds.,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5, p. 83.

② Pierre Daix, "Le XVIIIe siècle, cet inconnu",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No. 1152, 1965. cited by J. V. Polišenský,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the Crises and Revolutions of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in *Past and Present*, No. 39, 1968, p. 34.

③ Ivo Schoffer, "Did Holland's Golden Age Coincide with a Period of Crisis?", in Geoffrey Parker and M. Smith eds.,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 84.

④ [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35页。

四、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而另有一批学者对此则提出了更为谨慎的看法。

种种观点,孰是孰非?抑或是历史本来就是有多种面孔交叠在一起并且不停地在变幻着的。在思考这一问题的同时,同样令人深思的是:为何 I. 舍弗尔说“传统主义妨碍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传统主义是怎样妨碍这种研究的?西方史学的发展、变革是怎样打破传统主义的研究障碍的?西方史学界对 17 世纪历史到底进行了怎样的研究?也即它是围绕着哪些方面展开的?取得了哪些成果?又有何不足?更为重要的是,20 世纪中叶以来对此问题的研究与西方史学的发展、变革有何关联?17 世纪究竟在西欧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中处于何种地位?在洗掉重重油彩之后,17 世纪西欧社会将以怎样的面目示人?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方式来重新认识西欧社会的这段发展历程呢?西方史学界对 17 世纪历史的研究对我国史学界的史学研究有着怎样的启示?我们又应该怎样利用它的研究成果,以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继续研究?

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予以解答,是促使笔者选择对 17 世纪西方文明的研究的主要原因。同时,笔者以为,如果我们想发现真正促成西方文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因素,我们就必须历史地考察整个西方的社会-文化的、生态-经济的以及文化的体系,而这也就是本文所称的文明体系的主要内容,这个体系既提供了又限制着我们所有人历史思考的可能性。

但也必须坦诚地承认,以笔者目前的学术功力、所拥有的学术研究条件,在一本二十万字的著述中想要完成对这一系列庞大而复杂问题的探究,无疑是十分困难的。然而,无知者无畏,笔者抱着极大的勇气试图在文中通过吸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抛砖引玉,给出自己的理解。还要说明的是,这篇小文不想也不可能写得面面俱到,而是试图以气候的角度出发,从气候的外生冲击视角去考察由此引发的 17 世纪西欧社会的连锁反应。

为了文章的顺利进行,本文将本着忧患意识、学术敏感和人文关怀精

神,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拟在努力吸取各个相关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特定的空间——西欧文明区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延长的17世纪(约1580—1720年)的发展状况这一课题做一分析、研究。

目录

- 第一章 国内外研究状况 / 001
- 第二章 气候与生态：西方文明变迁的基调 / 039
- 第三章 精神与文化：戴着镣铐的舞蹈 / 078
- 第四章 军事与战争：锻造西方文明 / 121
- 第五章 人口与社会：危机与变革 / 158
- 第六章 西方文明与外部世界 / 192
- 结论：危险与机遇 / 217
- 附录 / 226
- 后记 / 235

第一章

国内外研究状况

第一节 17 世纪西方文明的研究现状分析

一、国外学者对 17 世纪西方文明的研究现状分析

(1) 20 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学术界对 17 世纪的研究

综观西方学术界对 17 世纪西方社会的研究,笔者以为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在 17—20 世纪中叶的第一阶段,西方学人对 17 世纪西方社会尚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专门研究,研究成果不多,关于其评价、看法的只言片语更多包含在诸如法国学者伏尔泰的《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德国学者兰克等人所著的一些通史和国别史著作之中。而到了 20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学术界对 17 世纪西方社会状态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西方学术界把 17 世纪作为一个整体的时段,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涌现出大批研究成果,加深了人们对于 17 世纪的认识。

17 世纪的西方人,切身感受到了这个时代带给他们的一切,因而对其所处的时代也有着独特的认知和感受,这种观感诉诸笔端,便形成了他们对社会与文明进行的并不系统、全面的最初研究成果。

“永恒的上帝啊!我看见了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正在出现!我为什

么不能再变得年轻呢？”^①这是生活于约1466—1536年的尼德兰人文主义学者德西迪里·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对他所处时代做出的热情洋溢的评价，表达出一种对当下美好生活的幸福感受和自豪、自信的心态。然而，就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之后，西方人对其所处时代的感受却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与生活在16世纪的前辈那种幸福、自得、自满、自豪的感觉形成了鲜明反差。专制、独裁、起义、暴动、叛乱等种种恶政、劣行、冲突和革命接踵而至，而又迅速弥散遍布于西欧各地区，从而使得当时的西方人先是震惊，而后又陷于一种相当普遍的失望与悲观境遇之中。1643年，英国教士杰里迈亚·惠特克(Jeremiah Whittaker)不无欣慰地通告议会下院，处在动荡不安中的英国人在西方并不孤单：“这是动荡的岁月，而且这种动荡无处不在：巴拉丁、波希米亚、德意志、加泰罗尼亚、葡萄牙、爱尔兰、英格兰。”^②而约翰·古德温(John Goodwin)则在此前的一本议会宣传册中宣称，英格兰与国王的斗争将蔓延至许多大国，如法国、德意志、波希米亚、匈牙利、波兰、丹麦、瑞典和其他一些国家。^③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则写道：“从赫拉克勒斯柱到印度最远的边境……自由被如此长久地放逐，如此漫长地放逐。”^④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也指出，17世纪中期的混乱令人难忘。^⑤

无独有偶，欧洲大陆上，荷兰人利弗维·范·艾特泽玛(Lieuwe Van

①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55页。

② H. R. Trevor-Roper,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revor Aston ed., *Crisis in Europe 1560 - 1660*,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5, p. 63; Gary Martin Best,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 HongKong: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3, p. 112; Christopher Hill, "Introduction", in Trevor Aston ed., *Crisis in Europe 1560 - 1660*, p. 2.

③ C. Hill,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London, 1959, p. 131, 转引自 Christopher Hill, "Introduction", in Trevor Aston ed., *Crisis in Europe 1560 - 1660*, p. 2.

④ Christopher Hill, "Introduction", in Trevor Aston ed., *Crisis in Europe 1560 - 1660*, p. 2.

⑤ Geoffrey Parker and M. Smith eds.,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5, p. 83, p. 3.